

阎肃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上接第1版《他把光和热奉献给社会主义文艺事业——阎肃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侧记》)

一个个植根于生活沃土的故事，一句句发自肺腑的箴言哲理，让现场听众受益匪浅。作家次仁罗布表示，听了阎肃同志的先进事迹，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凭着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为时代讴歌，为军队讴歌，创作出很多精品力作。正是他的执著与坚定，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今后要以阎肃同志为榜样，努力创作好的作品，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

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空政文工团演员、第五代“江姐”饰演者王莉在报告会上哼唱起人们熟悉的《红梅赞》，这是对阎肃这位老艺术家最恰当的写照：和人民在一起，人民才会记得你；与生活同行，生活才会回馈你；以理想为曙光，才会照亮创作的漫漫征途。这歌声也寄予了人们对病榻之上的阎肃最真诚的祝福，祝愿这位共和国文艺事业荣辱与共的老艺术家早日康复，期待他再为这个世界谱写新的华彩乐章！

（李晓晨 任晶晶 许莹 夏宁竹）

（上接第1版《压数量提质量力推精品——聚焦全国性文艺评奖改革》）

同时，文化部取消了所属单位举办的全国性文艺比赛和展演中的评奖活动。对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举办的节庆活动中的全国性文艺评奖仅保留了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1项，压缩取消了5项；对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的节庆活动中的全国性文艺评奖仅保留了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节（河北）、中国国际马戏节（广东）2项，压缩取消了4项。

文化部负责人介绍，文化部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文艺评奖改革，文化部相关职能司局正在对文华奖、群星奖、动漫奖评奖办法（章程）进行修订，进一步完善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和评审机制。

——完善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文华奖按照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标准评价作品；群星奖把文化惠民贯穿于评奖全过程，突出群众文艺特色；动漫奖更加突出社会效益优先，根据动漫特点进一步细化思想性、艺术性评价标准。

——完善评委结构，建立评选委员会和专家评委库，坚持专家评委和群众评委相结合，注重评委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同时，规范评奖的报送、评选、公示等程序，增强评奖透明度。

——加强宣传，发挥优秀文艺作品引领作用。文华奖把获奖优秀作品纳入政府采购和公共文化服务范围，组织深入基层演出；群星奖评奖过程中对参赛作品进行公益性展示和传播，评奖结束后开展巡演；动漫奖把评奖与评论、提高、推广结合起来。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将群众评价、专家评议与上座率、收听收视率等有机结合

按照此次评奖改革最终确定的方案，中国电影华表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均为两年评一次，奖项和名额都大幅压缩。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人说：“如何在作品规模数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使奖项更集中更精简，

就需要制定更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进行公正严格的评审。”

面对新情况新变化，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真研究积极探索，将群众评价、专家评议与上座率、收听收视率等有机统一起来，要求按照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标准评价作品，按照德艺双馨的标准评价人才。

按照两年一届的评奖周期，2015年是电影华表奖和电视剧飞天奖的评选年。2015年12月28日，电视剧飞天奖颁奖典礼在杭州举行，同日，第16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的评选工作也已完成。这两次评奖的奖项设置，都严格遵照改革要求，压缩了奖项和名额。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人说，总局主动回应各界的各种声音，使广大影视从业者充分认识、理解文艺评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与此同时，加强对获奖优秀作品的宣传，加强对违规举办的全国性文艺评奖及评奖中不正之风的舆论监督。

中国文联：建立完善具有中华文化审美精神的作品综合质量评价体系

中国文联对已经启动和即将举办的全国性文艺评奖按文件精神进行大幅压缩调整——中国文联全国性文艺评奖总数做大幅度压缩，压缩比例78%，子项数总数做大幅度压缩，压缩比例71%，三级分项全部取消，取消了其他节庆中的全国性文艺评奖。

中国文联负责人介绍，文联这次评奖改革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评委库的实施规范，对评委自身的学术素养、艺术水准和专长、思想作风、业界口碑和影响以及年龄等方面提出了严格细致的要求，对坚持评委的回避、轮换、保密原则和执纪做出了严格规定。

奖项数量虽然减少了，但是奖项分量加重了，含金量提高了，认可度提高了——一些艺术家反映，这样的评奖结果让人更服气，奖项的权威性自然也就增强了。还有一些文艺工作者认为，评奖改革使评奖回归到促进创作的初衷，这样有利于去除创作中的浮躁情绪，促使文艺工作者把心思用在创作上，用在精益求精上。

精打磨作品上。

中国文联负责人说，下一步，中国文联将结合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着重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抓好“中国精神·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工程，同时，着力建立完善具有中华文化审美精神的作品综合质量评价体系，在评奖中进一步发挥文艺评论的引领作用。

中国作协：四大全国性文学奖项初步规范

目前，中国作协主办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经过认真调整、改进，评奖过程、程序、规则等均已初步规范和完善。

具体奖项调整是：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都分别明确为每四年评选一次；茅盾文学奖评选对象为长篇小说，每届获奖作品不多于5部；鲁迅文学奖子项确定为7个，包括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理论评论和文学翻译7个子项，每个子项获奖数不多于5部；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每届获奖作品数量由20个压缩到18个；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由中国作协与国家民委联合主办，子项由10个压缩到6个，包括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翻译（包括民译汉和汉译民），每个子项获奖数均不超过5个。

中国作协负责人说，近年来，中国作协对四大全国性文学奖项进行了大力改革，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进措施。2015年中国作协举办的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充分体现了评奖工作的公开、公正、透明，得到社会各界肯定。

据了解，除上述部门外，民政部、教育部正积极贯彻《意见》精神，加强对社会组织、学校、研究机构等举办全国性文艺评奖的管理，国家工商总局也正在研究具体措施，禁止企业举办全国性文艺评奖。

（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记者 周玮 姜潇）

新观察·年度综述

2015年诗歌：

二维码时代：诗歌回暖了吗

□霍俊明

了。确实，以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对诗歌生态的影响已经成为现实，似乎每个人都成了毫无差别的“手机控”、“微信迷”和“屏幕人”。那么，诗歌真的回暖了吗？

“传媒话语膨胀时代”的微信平台因为取消了审查和筛选、甄别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诗歌多元化发展，使得不同风格和形态的诗歌取得存在合法性的同时也使得各种诗歌进入到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失范状态，降低了诗歌写作与发表的难度。就当下诗歌来看，写作者、评论者和传播者的表达欲望被前所未有的激发出来，“自由写作”、“民主写作”、“非专业化写作”正在成为新一轮的神话。

“微信诗歌”作为一种新现象需要时间的检验，需要进一步观察、辨析和衡估，但是就已经产生的现象、问题和效应来看，也需要及时予以疏导和矫正。软绵绵、甜腻腻的心灵鸡汤的日常小感受、身体官能体验的欣快症、新闻化的现实仿写以及肤浅煽情的美文写作大有流行趋势。

就目前的工人阶层的诗歌写作来看，机器无论是对个人生活还是整体生存境遇以及精神状态都带来了非常“现实”的影响。“草根诗人”自发的写作状态和现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下人民大众抒发时代精神和现实观照的潮流，不仅是“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而且更重要的是真正做到了“人民抒写”、“人民抒情”、“人民抒怀”。对于工人诗人来说，他们不像其他诗人那样奔赴现实，而是直接身处现实之中。他们的写作直接来自于自身的生命体验，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进行对话，真诚质朴有痛感，展示了艺术最原初的鲜活形态。这一文学经验不仅关乎个人冷暖和阶层状态，而且与整个时代精神直接呼应。这些诗朴实、深沉，具有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和现实主义的风格。

但是，“草根诗人”写作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比如对现实和自我的认识深度不够，在处理现实题材和个体经验的时候没很好地完成从“日常现实”到“诗歌现实”的转换、过滤和提升。其写作有浮泛、狭窄、单一和道德化倾向，缺乏美学上的创造力，社会学意义大于文学意义。与此同时，人们在谈论这些“草根诗人”时又不可避免地与阶层身份、社会道德、公平正义、悲悯同情、身份焦虑、生存命运等关键词缠绕在一起。

围绕“草根诗人”所生发的各种观点、立场不仅显示了移动自媒体时代诗歌在生产、传播、接受和评价等方面的新变，而且也揭示了不同阶层的人通过这些来自基层的诗人所显现的对社会和人生的不同理解。

历史上被铭记的诗人往往既具有美学的创造性又有历史的重要性和时代的发现性。无论哪个时代，不管出现多么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诗歌事件和大张旗鼓的诗歌活动，最终留下来的只有诗歌文本。

由社会关注度极高的“草根诗人”写作，我们注意到诗人对现实尤其是社会焦点问题和公共事件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而直接，这一定程度上与媒体开放度有关。当下对“诗人与现实”、“诗歌与生活”问题的热度不减的争议使得

甚至百万之众的“草根”写作群体确实构成了新世纪以来的新生态。

这一自发的、原生的直接与生命体验相关的大众写作有别于以往的学院派、民间派和知识分子等专业诗人的写作美学。以“草根诗人”为代表的诗人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实感、人文关怀、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他们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对话，有痛感、真实、具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之诗”。与“草根诗人”现象相应，诗歌写作的题材化、伦理化和道德感也被不断强化，底层、草根等社会身份和阶层属性得到空前倚重。而底层经验、生存诉求、身份合法性在诗歌写作中得以一定程度地体现，这一趋向围绕着年初的余秀华事件展开并扩展开来。

“草根写作”不仅代表了一种新美学，而且在社会层面更具有意想不到的精神号召力。

“微信诗歌”作为一种新现象需要时间的检验，需要进一步观察、辨析和衡估，但是就已经产生的现象、问题和效应来看，也需要及时予以疏导和矫正。软绵绵、甜腻腻的心灵鸡汤的日常小感受、身体官能体验的欣快症、新闻化的现实仿写以及肤浅煽情的美文写作大有流行趋势。

就目前的工人阶层的诗歌写作来看，机器无论是对个人生活还是整体生存境遇以及精神状态都带来了非常“现实”的影响。“草根诗人”自发的写作状态和现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下人民大众抒发时代精神和现实观照的潮流，不仅是“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而且更重要的是真正做到了“人民抒写”、“人民抒情”、“人民抒怀”。对于工人诗人来说，他们不像其他诗人那样奔赴现实，而是直接身处现实之中。他们的写作直接来自于自身的生命体验，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进行对话，真诚质朴有痛感，展示了艺术最原初的鲜活形态。这一文学经验不仅关乎个人冷暖和阶层状态，而且与整个时代精神直接呼应。这些诗朴实、深沉，具有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和现实主义的风格。

但是，“草根诗人”写作也有明显的局限性。比如对现实和自我的认识深度不够，在处理现实题材和个体经验的时候没很好地完成从“日常现实”到“诗歌现实”的转换、过滤和提升。其写作有浮泛、狭窄、单一和道德化倾向，缺乏美学上的创造力，社会学意义大于文学意义。与此同时，人们在谈论这些“草根诗人”时又不可避免地与阶层身份、社会道德、公平正义、悲悯同情、身份焦虑、生存命运等关键词缠绕在一起。

历史上被铭记的诗人往往既具有美学的创造性又有历史的重要性和时代的发现性。无论哪个时代，不管出现多么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诗歌事件和大张旗鼓的诗歌活动，最终留下来的只有诗歌文本。

由社会关注度极高的“草根诗人”写作，我们注意到诗人对现实尤其是社会焦点问题和公共事件的关注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而直接，这一定程度上与媒体开放度有关。当下对“诗人与现实”、“诗歌与生活”问题的热度不减的争议使得

写作者对“现实感”的理解发生分歧。一部分人强调诗歌的“介入”、“见证”、“及物”、“现实性”，强调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在现场和烟尘滚滚的生活面前，将自己融入到工厂甚至上千度的高温中去感受生活的残酷性；另一部分则认为诗歌应该保持独立性和纯粹性以及个体主体性，认为应该重新对“生活”、“现实”、“时代”进行衡估和再认识，也就是说难道有诗人是在“生活”之外写作吗？

应注意的是，诗歌的“现实感”最终是“语言的现实”，因为诗歌的语言不是日常交际和约定俗成的，而是生成性和表现性的。我们看到的是微

信话语、新闻话语和日常话语等“消息性语言”对“诗意语言”的冲击。“现实”成为“现实感”必须要通过语言、修辞、记忆、经验和想象力来转换并最终完成为“文本现实”。而新媒体话语对诗人个体性写作的空前鼓吹，使得口语写作、私人经验、个体抒情、消解诗意、日常叙事的无难度写作成为普遍现象，“口语”沦为“口水”，“个体写作”导向的是“平庸”和“碎片化”，“自由”“开放”导向的是“自恋”和“自闭”。换言之，全媒体时代的诗歌写作空间如此开放，而每个人的写作格局和精神世界竟然如此狭仄，每个写作者都在关心自我却缺乏“关怀”，每个人都热衷于发言表态却罕见真正建设性的震撼人心的诗歌文本。

应注意的是，诗歌的“现实感”最终是“语言的现实”，因为诗歌的语言不是日常交际和约定俗成的，而是生成性和表现性的。我们看到的是微

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无论是相关诗选的出版、刊物的诗歌专题，还是从学理的角度予以历史性的梳理和总结，再次证明了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家国情怀。再谈论“抗战诗歌”以及抗战胜利以来相关的诗歌创作，不仅有诗歌美学的必要性，而且是诗歌历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抗战期间在解放区开展的“诗歌民族形式”的广泛争论以及同时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展开的大规模的朗诵诗运动，都在进一步探讨新诗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抗战诗歌因为特殊的思想性、社会性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又因处于中国新诗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而具有发展的延续性。

在新世纪诗歌已经走完15年之际，对新世纪诗歌尤其是当下的诗歌进行评价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有研究者认为，在社会和文化的转型期，诗歌仍然处于并不乐观的时代，有论者认为当下诗歌受到传媒、技术、资本和市场的影响，丧失了知识分子立场和批判意识以及先锋精神。确实，当下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转型使得诗歌写作必须做出调整和应对，甚至一定程度上对已有的写作模式和诗歌观念进行了校正，尤其是在新闻化的现实境遇面前，找到一首整体性的、具有“发现性”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诗歌是很难的。

诗歌批评不是说好话坏话，而是要“说真话，讲道理”，批评的高标准应该是像庞德所说，“不是画地为牢或制定禁律，它是提供起点。它可以使迟钝的读者警觉。”而当下的诗歌批评看起来很热闹，但是聚集于新媒体平台上的短评、热评、酷评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批评，缺乏学理性和建设性，往往是没有底线的恶评或追捧，由此更要促进有意义、有建设性的理论争鸣，端正批评风气。

中国新诗自诞生至今已近百年历史，在这期间中国新诗从草创、实验到动荡、建设，历经众多诗人的艰苦努力，取得了辉煌成就，部分作品经历时间检验已成为经典。而本年度的诗集出版不仅数量上呈现井喷趋势，而且不同代际、不同风格的诗集代表了新世纪以来新诗多向度发展的成果。但中国新诗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系列争议颇多且仍未解决的诗学问题，这都需要从学理上予以梳理、辨析和反思。百年新诗在寻找“自身传统”的情势下，伴随着文体自身的逐渐成熟，新诗正在找回自信，在强调“汉语”、“本土经验”以及“大国写作”（欧阳江河）的吁求下，诗人对“本土现实”的关注、处理成为写作的内驱力。对新诗历史的总结、对经典化文本的推介、对自身传统和合法性依据的确立成为本年度诗歌诗丛、诗集、诗选出版的内在化要求。这都旨在回溯百年新诗的历史脉络，时代状况和美学趋向，及时梳理新诗的现状，试图强化新诗的合法性依据和文体自信力。这些既显示了专业性又带有普及性的新诗经典化工程都试图在规范和确立“好诗”的标准。

2015年，新诗研究成果的一大亮点是“当代新诗话”丛书（陈超《诗野游牧》、于坚《为世界文身》、赵毅衡《断无可解之理》、耿占春《退藏于密》、沈奇《无核之云》）的推出，集中展示了诗歌批评和研究的新方法与可能的空间。

诗歌的传播与生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迅捷，我们必须注意，自媒体和公共媒体更多的时候所关注的不是诗歌自身的成色和艺术水准，即使关注也是侧重那些有热点和新闻点的诗，更多是将之视为一场能引起人们争相目睹的社会事件。时下微信等平台对诗人的“形象塑造”是值得进一步甄别与反思的。人们很多情况下关注的并非诗歌本身，而往往是被缠绕和附于诗歌之上的“非诗歌”的东西所影响和遮蔽，进而妨害和扭曲了诗歌形象，也就是往往是在伦理学、道德感和社会学等“外围”层面谈论诗歌活动、诗歌现象和热点的诗人事件。

微信时代诗歌写作的危险

“微信诗歌”作为一种新现象需要时间的检验、观察、辨析和衡估。就已产生的现象、问题和效应来看，也需要及时予以疏导和矫正。软绵绵、甜腻腻的心灵鸡汤的日常小感受、身体官能体验的欣快症、新闻化的现实仿写以及肤浅煽情的美文写作大有流行趋势。

多年来人们已习惯“诗歌”与“大众”之间天然的疏离关系，诗歌和“大众”一旦发生关联往往是以噱头、娱乐事件、新闻爆点的方式出现。很多人对2015年诗歌的最大观感就是诗歌很热闹，而且是不一般的热闹。在各种诗歌活动和诗歌事件中，似乎睽违的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诗歌热潮再次降临，诗歌重新又回到了“读者”和“社会”中来，新诗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被空前拉近

草根诗人及诗歌与现实

以“草根诗人”为代表的诗人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实感、人文关怀、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其写作有浮泛、狭窄、单一和道德化倾向，缺乏美学上的创造力，社会学意义大于文学意义。

2015年，诗歌界还有一个重要的写作趋向就是，随着以余秀华、许立志、郭金牛、乌鸟鸟、老井为代表的“草根诗人”的崛起和涌现。几十万

历史上被铭记的诗人往往既具有美学的创造性又有历史的重要性和时代的发现性。无论哪个时代，不管出现多么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诗歌事件和大张旗鼓的诗歌活动，最终留下来的只有诗歌文本。

2015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